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為四節。第一節探討我國公民教育的內涵；後三節則針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理論和實證研究加以歸納和整理，以支持本研究方法和作為實證研究之依據。第二節論述政治信任感的意涵；第三節探討傳播媒體的效果。第四節則針對研究變項，列舉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文獻。

第一節 公民教育的內涵

任何民主社會想要維持社群的穩定與健全發展，就不能單靠其政治制度的建構，更重要的是在此民主政體中的公民(民眾)是否具有維持其政治體系良好運作的意願與能力。而公民此一意願與能力的培養，即為公民教育的要務之一。

公民教育之目的在培養健全的公民，以促進國家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至於本文的研究主題—新聞媒體閱聽行為及政治信任感，兩者與公民教育之間的相關性，則可藉由探索公民教育的內涵得知。

壹、公民資質與公民教育

具體而言，公民教育就是培養現代公民應具備之能力的教育，其目的在培養具備理想的公民資質(citizenship)的公民，使其能於現代民主社會中有效行動，並有助於社會整體之發展。但學者對於「公民資質」卻具有各種不同的看法。Hughes (1994)在其研究中曾由公民知識(civic knowledge)、公民德行(civic virtues)和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三方面描述公民資質(引自單文經,1996)。張秀雄與李琪明在進行「我國理想公民資質之研究」時,亦將公民資質分為公民知識、公民德行及公民參與三個層面進行探討,該研究中並建議公民教育內容可依據理想的公民資質加以建構(張秀雄、李琪明,2000)。由上可知,公民教育既在培養具備理想公民資質的公民,公民資質自然成為公民教育內涵的建構依據,因此探討公民教育須由公民資質的三大層面—公民知識、公民德行及公民參與著手。

一、公民知識

公民知識是指對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這是現代民主社會公民資質的核心概念。一個現代公民應該對於自由與正義、公平程序、異議表示、法治平等、分殊歧異等概念有清楚的認識。同時對一般的權利、義務觀念有所了解(單文經,1996)。

公民教育應將二十一世紀公民所需的公民知識納入,並強調學習內容與實際生活經驗之聯結,目標在使學習者具備基本的公民知識,能有效扮演公民角色,並進而成為知識豐富、見識廣博的公民。

二、公民德行

公民德行包括開放的胸襟、善待他人、相互尊重與包容等特質。公民德行要求寬容、公開討論及理性對話,不同價值主張者能相互尊重,並具有自我批判與反省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求公民具備為社會奉獻的精神,願意為公眾利益犧牲其個人利益。

將公民德行納入公民教育的主要意義是提醒學習者,在公共問題的探討過程中,應從眾多的資訊裡尋求思慮純潔、具道德警覺,且深思熟慮、合乎道德規範的解決辦法(黃惟饒,1996)。此外也在提醒教

育者，應培養學習者多元思考以及自我批判、反省的能力，並協助其學習以客觀的態度、採取合理的方式來面對歧異與問題。

三、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不單是參與的權利、參與的意願，更重要的是要有參與的知識與能力。未具備足夠的知識與能力，就缺乏行為的準則，那麼公民參與不但不能形成助力，反而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沒有良好的德行，則公民參與亦可能造成社會的禍害(溫明忠、鄧毓浩、張樹倫、董秀蘭，1997：6)。

公民參與的能力包括獲取與運用資訊的能力、民主參與的能力以及社會性行動的能力。其中，獲取與運用資訊的能力強調現代公民應該學習如何運用資訊科技及大眾傳播媒體，獲得最新資訊與知識，並能將所學之資訊與知識妥善運用(張秀雄、王錦雀，1997)。

將公民參與納入公民教育的意義在於強調，學習者必須具備參與的能力，才能將所學運用於公共事務的參與過程中，並成為社會進步的助力。此外，公民教育應重視培養學習者運用資訊科技與傳播媒體的能力，方能培養出掌握最新知識、適應社會快速變遷的現代公民。

綜而言之，公民教育的內涵相當廣泛，涉及了道德、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凡是現代民主社會所需具備的公民知識、公民德行與公民參與能力，均屬於公民教育的範疇。

貳、公民教育與政治教育

Galston(1991)曾指出，公民教育的目標在培養能在該政治社群中有效行動的公民，並支持該政治社群；如果某一政治社群的公民教育無法有效地支持政治社會的穩定運作，則該公民教育是失敗的(引自劉姝言，1997：70)。可知公民教育的重要課題之一即在培養適合並支持該政治社群的公民，亦即促進政治教育的達成。

公民教育究竟對於政治教育有何助益？依據學者洪泉湖的看法有下列幾點(洪泉湖，1998：276-277)：

一、培養公民文化

民主國家的政治持續與政治發展，需要民主的公民文化之支持。民主的公民文化包括對民主政治的基本認知、對政府和政治的情感、黨派信仰模式、政治參與能力和責任、政治效能感、政治認同、政治信任、體系規則、政府效能，以及對政治體系輸入輸出之了解等(Almond & Verba；Rosenbaum，1975；引自洪泉湖，1998：276)。現代的公民教育即在培養此種公民文化。

二、使民眾體現「主權在民」的觀念

主權在民的理念，自從洛克、盧梭提出後，早已遍及世界，世人多能琅琅上口。但在現實的政治情境中，卻往往無法落實，追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人民未能真正理解主權在民的真諦，並決心去捍衛它。

公民教育就是要培養人民的民主政治文化，使每個公民能真正了解人民乃主權者，且當主權被剝奪或竊竊時，決心加以奪回。

三、宣揚「人民權利」的概念

在威權時代，公民教育往往淪為統治者從事政治馴化的工具，它教導人民如何忠誠守法、犧牲個人報效國家，卻不告訴人民其應有的權利。但在民主社會，公民教育的重點反而是要告訴人民其應有的權利，並教導其保障權利的方法。但在強調人民權利的同時，也需告訴人民，作為國家主人應有的責任為何。

四、達成政治安定和國家認同

根據政治系統理論，政治系統想要穩定持續，必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治支持則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政治系統必須回應人民的「需求」，使其獲得滿足；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政治社會化，使人民認同此一政治系統(Easton, 1965; 引自洪泉湖, 1998: 277)，公民教育即是後者。透過公民教育，不但可以培育公民對政府與政治的支持，也可以促進對國家的認同。

歸納本節討論結果，公民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具備公民資質、符合現代民主社會需求的健全公民。也因此，公民教育的內涵相當廣泛，包括公民知識、公民德行以及公民參與能力。藉由公民教育的施行，政治教育也得以推展，公民教育將有助於培養適合民主政治發展的公民文化，使「主權在民」、「人民權利」的觀念得以深植人心，並有助於政治的安定與國家認同的建立。

另一方面，公民教育對於本研究具有幾點啟示。第一，高中生既然曾在國小、國中、高中階段由淺而深地接受公民教育，必然已經學

習到基本的公民知識，對於民主政治與政府的運作已有了一定的認知。第二，高中生在其政治認知的基礎上，具備解讀政治新聞的能力，政治新聞對他而言是具有意義的訊息，並能在接收政治訊息後，對於政府運作、政治情境作出評價與判斷，進而決定個人對於政府的支持與信任程度。因此探討其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具有研究上之價值。此外，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乍看之下或許與公民教育的關聯性不大，但經由本節文獻探討可了解，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公民參與能力(獲得與運用資訊的能力)密切相關，而政治信任感更是公民文化涵蓋的範圍，因此本研究主題—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亦屬於公民教育的範疇。

第二節 政治信任感的意涵

政治信任感是指民眾對於政治系統的信任程度，並會進一步影響民眾的政治支持，本研究的目的，即在了解高中生「政治信任感」的程度。政治信任感是一種政治態度(Gamson, 1971)，因此欲探討政治信任感的內涵，就必須先對政治態度有所瞭解。

壹、政治態度的概念

一、政治態度的定義與成份

Allport(1935:810)將態度界定為：由經驗所組成的一種心理和生理的準備狀態，對於個人面對各種相關對象與情境時的反應具有指導性或機動性的影響。

Allpor 並將政治態度界定為「由政治認知、政治感情與政治行為趨向所共同組成的一種心理或生理組織，用以引導或影響個人對有關政治目標或政治情境的反應」(引自林嘉誠、朱浚源，1990：269)。

其中，認知包括個人對客觀環境訊息的蒐集與彙整，以及既存知識與經驗，並能影響個人的社會判斷(郭軒仲，2001)。個人隨著對政治情境的認識而逐漸形成持久性的政治認知。感情或依據認知，或將目標、情境簡化，而以喜好不喜好的方式反應。政治情感即是指對政治目標與政治情境的喜好、評價與情緒反應。政治行為傾向則是指在特定政治情境下，為了達成政治目標而準備採取的行動傾向(林嘉誠、朱浚源，1990：269)。

綜合前文可知：政治態度是指個人在獲取政治訊息後，逐步形成對政治目標或政治情境的一種反應傾向。此種反應傾向具有組織性與持久性，並協助個人對政治環境做出判斷。本研究欲探討的政治信任感，也是基於政治認知的基礎上，對於政治目標進行評價後，決定應否給予支持與信任的一種心理反應傾向。

二、政治態度的形成

政治態度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個人歷經「政治社會化」後的結果。個人自兒童時期開始的各種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經驗，均有助於形成個人的政治態度。

Hess 和 Torney (1967)曾以四種模式來說明政治態度的獲得和發展：1. 累積型：政治態度是由片斷的知識、消息與活動累積而成；2. 人際關係轉移型 (interpersonal transfer)：強調政治學習是一種人際關係的轉移；3. 認同模式 (identification)：兒童模仿、認同「重要他人」的政治態度，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態度、行為、觀念。重要他人可能是父母、師長、同儕或媒體上的權威人物；4. 認知—發展模式 (cognitive development)個人對政治現象的了解，往往受限於其認知發展和領悟能力。隨著認知結構的發展，兒童對於政治目標與政治情境的瞭解越充分，也逐漸形成個人的政治態度(引自呂亞力譯，1973)。

由 Hess 和 Torney 的四種模式可以推知，新聞媒體所傳遞的政治資訊與政治人物形象，在長期累積下，將有助於民眾政治認知的成型，並影響政治態度的形成，而藉由認同媒體上的權威人物，政治態度亦受影響。

政治態度又是透過哪些機構而形成？政治態度既是「政治社會化」的結果，因此政治社會化機構(家庭、學校、同儕媒體和傳播媒體)自可視為政治態度的形成機構：

(一)、家庭

家庭結構與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政治心態等變項，被認為會影響子女的一般心理與政治心理特質。例如父母與子女的政黨認同有高度相關性(林嘉誠，1989)；父母的教育程度會影響子女的政治認知與態度(彭懷恩，1997)。

(二)、學校

透過課本內容、儀式教育、教師的價值與行為模式、教學方式、學校氣氛與管教方式等，學生很容易學習到政治態度與意見(林嘉誠，1989)，兒童對政治認知的發展也多是透過學校管道。近來的研究並顯示，學校對政治取向形成的影響已超越家庭(彭懷恩，1997)。

(三)、同儕團體 (peer group)

同儕團體會對彼此的個性、人生觀產生影響，並間接影響其對政治的觀念與態度(陳穆瑩，2001)。當同儕團體的吸引力增加，互動次數頻仍，受同儕團體的影響也越大。隨著年齡增長，尤其到了年輕至成年階段，同儕團體的影響較父母還大(彭懷恩，2001)。

(四)、大眾傳播媒體

「傳播媒體」此一機構是在 1960 年代才在研究中陸續出現，並逐漸成為重要指標。Dawson 與 Prewitt(1969:194)指出，由於傳播科技的進步與傳統社會結構的式微，大眾傳播媒體已逐漸成為政治取向的塑造者。傳播媒體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影響力日受重視。

本研究的重點在探究接觸新聞傳播媒體，與政治信任感之間是否

具有關聯性。因此，政治態度的形成機構中僅就大眾傳播媒體進行探討。並將家庭的部分變項（如省籍、家庭社經地位）視為受試者個人的背景因素，加以討論。

貳、政治信任感的內涵

一、政治信任感的定義

「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早期並未受到重視。1960 年代以後，政治學者目睹社會大眾對執政黨的批評，對公共政策的指責，以及各種社會抗議活動的此起彼落，才開始將注意力投注到政治信任感上，有關政治信任感的研究便與日俱增。但在這些著作中，大多以常識性的意義加以應用，而且各家定義眾說紛紜。下文僅列舉數個定義，以便釐清政治信任感的概念。

1. 政治信任感是一種政治態度，指涉系統成員對政治體系產出品質的一般期待。政治信任感比針對特定公共議題(public issues)而形成的態度更具一般性、累積性及穩定性(Gamson, 1971:41)。
2. 政治信任感可被視為對政府(執政當局)及政府產出(政策)的基本評價和情感取向(Miller, 1974a:952)。
3. 政治信任感是一種即使權威當局未被嚴密監督，成員仍相信他們的利益能被妥善照顧的感覺(Easton, 1975:447)。
4. 政治信任感不限於針對政府政策，對於政治人物或政府作為也可採取信任或者不信任的態度(Citrin, 1974:973)。

5. 政治信任感是指對於公共政策產出的評價高低以及對於執政當局表現普遍認同或不認同的傾向(Muller & Jukam, 1977:1589)。
6. 政治信任感可被視為一種相信政治領導人物能依據某些規範性的期待(如誠信、能力、平等、效率等)(Miller, Goldenberg & Erbring, 1979:81)。
7. 政治信任感是指政治成員對政治系統角色任職與政治系統的輸出(政策)的信任程度(辜淑琴, 1985:53)。
8. 政治信任感是指對政府滿足民眾需要之努力和政府內部成員作為的評價, 以及對政府的基本情感共同構成的取向(陳連生, 1986:52)。
9. 政治信任感是指對政府官員、政策、政治人物、政治現象, 甚至政治典則、政治系統、政治結構的信任態度(林嘉誠, 1989:189)。
10. 政治信任感是針對政府的運作是否依據民眾之規範性期待進行評價後的一種心理取向。評判的標準包括官員的品德、能力、效率, 以及政策決策的正確性(Hetherington, 1998:791)。

由上述定義中, 我們可以歸納出政治信任感具有的特質:

(一)政治信任感是一種政治態度, 它具有政治態度的特性:

1. 政治信任感是個人的內在心理狀態, 無法進行直接的觀察, 故從事研究時必須藉助工具, 才能加以測量。
2. 政治信任感經由經驗學習而得, 具有相當的持久性。即個人經由政治社會化過程, 逐漸形成政治信任感; 信任感傾向一旦形成, 就不會輕易改變。
3. 政治信任感是個人的反應準備。在面對政治情境的刺激

- 時，個人對於政治的信任程度將會影響其反應方式與行動。
- (二)與政治態度的差別在於，政治態度雖具有認知、情感和意向三種部分。但政治信任感卻是以評價或情感的成分最為凸顯。
- (三)政治信任感的對象，可以是政府整體、政治人物或政府政策。

因此我們可知，政治信任感是政治態度的一種，是個人針對政治人物、政府整體或政府政策進行評估後，決定信任與否的一種心理傾向。與一般針對某性特定公共議題或政治人物而產生的意見或情感不同；政治信任感是一種更基本的政治取向，經由長期累積所形成，也更具一般性與穩定性。

二、政治信任感的取向對象

政治態度的取向對象，學者大都認同 Easton 的說法，以政治社群、政治典則與權威當局作為取向目標；至於政治信任感的取向對象，曾引起廣泛的討論，由政府政策、權威當局、政治人物，乃至政府機關、政權合法性等，學者各有不同主張(Easton, 1975; Citrin, 1974; Miller, 1974a)，可確定的是，政治信任感的取向對象涵蓋了整個政府(Markus, 1979; Weatherford, 1984; 引自 Hetherington, 1998)；Gamson(1971)亦曾指出，政治信任感與其他政治態度的不同處在於，將政府視為取向目標。

政治學者 Ranney 曾將政府定義為「為一個特定社會制訂及執行法律的一群人及一套機構的組織體」(Ranney, 1993:5)，因此政治信任感的取向對象包括了政府機構以及擔任政府職務者(行政官員、民意代表)。此外，政府的基本任務既是制訂與執行政策，民眾對於政策的好

惡、接受程度自然會影響他對政府的評價與信任程度。Gamson 即認為決策的內容以及所引起的(民眾)反應是政治信任與不信任的基本來源(引自 Aberbach & Walker, 1970:1202); Muller 和 Jukam 在歸納多位學者對於政治信任的定義後,亦指出政治信任感包括對於公共政策產出的評價高低以及對於執政當局表現的普遍認同程度(Muller & Jukam, 1977:1589)。

Craig, Niemi 和 Silver(1990)則指出政治信任缺乏的對象可分為兩大面向,第一是指對一般政治人物(泛指政府官員、民意代表)的不信任,第二是對整體政府運作的懷疑(引自張卿卿, 2002a: 142)。

本研究以政府當局作為政治信任感的取向對象,主要採取 Craig, Niemi 和 Silver 的主張,將政治信任的對象區分為政府成員(行政官員、民意代表)與政府整體運作兩個層面,並參酌 Gamson 的看法,將政府政策列入政治信任感的指涉對象。因此本研究的政治信任感是指一種對政府成員(包括行政官員、民意代表)的品質(品德、能力)以及政府作為、政府政策評價後所產生的一種信賴或懷疑的先存傾向(predisposition)。其中以「對政府官員信任感」與「對民意代表信任感」探討民眾對於政府成員的信任程度;「對政府與政策之信任感」則探討民眾對政府整體運作的信任程度;民眾對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信任程度的評判標準有二,即品德與能力。

總之,本研究的「政治信任感」是由「對政府官員信任感」、「對民意代表信任感」與「對政府與政策之信任感」所組成。並且假定,既然民代與官員是政府的重要成員,也是政府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者,那麼對於官員、民代的信任程度,與對政府整體的信任及政策的評價上,應該具有高度相關性—對於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越信任者,對於

政府與政策的信任程度也越高。至於官員與民代之間，兩者均是政府的重要組成份子，兩者的信任程度應該是相輔相成；但以國內目前行政院與立法院的對立衝突來看，民眾似乎只能決定信任哪一方的說法，兩者的信任程度似乎又呈現此消彼長的關係，因此政府官員信任感與民意代表信任感之間的相關性，也是筆者感興趣的問題。

三、政治信任感的重要性

政治信任感對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性，許多學者均曾對此加以論述。如 Aberbach 和 Walker(1970:1199)就指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決定政治變遷的一個重要因素，具有不信任感公民人數的增減，是社會衝突和緊張的敏銳觀察表。當一群數量可觀的民眾對政府變得不信任並開始提出要求時，政府便不得不去重新分配其資源或調整其制度以適應新壓力。……如果政府當局拒絕與不信任團體接觸，或制度過於僵化以致無法調整，將可能造成毀滅性的衝突或社會秩序的瓦解」。

由 Aberbach 和 Walker 的說法可知，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感高低，是攸關社會穩定以及政府順利運作的重要因素。相似的論點眾多，僅摘錄較具有代表性的說法，列舉如下。

「缺乏民眾的信任，政治領袖將無法順利作出各項決定，也難以獲得達成目標所需的各項資源。當政治不信任日益嚴重，民眾求變的慾望將日益增強；此時如有特定組織或個人出來引導，這股不滿的情緒將轉變為要求徹底改變的慾望」(Miller, 1974a:971)。

「民主政治建立於人民對政府的信任，當信任的基礎受損時，整個政府體系也將飽受威脅」(Miller, 1974b:1001)。

「信任對政治體系的重要性，似乎已有一致性的看法，信任促進政治系統的合法性，也有助其穩定，並且提供了執政者自由裁量的權利」(Abravanel & Busch, 1975:59)。

「人民政治信任感越高，政治支持越高。政治不信任感偏高者，有時造成政治疏離或政治冷漠，因而逃避政治。但也有人因而積極介入反抗性行為，向政府表達不滿，或要求更改政策(林嘉誠、朱浚源，1990：283-284)。

「大多數的學者均同意，政治信任感是民主政治順利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政治不信任感不只是政治不滿意的情緒反應，也是助長不滿情緒的有利因素(政治不信任感將引發民眾的非難，使政府更難解決問題，導致民眾對於政治更加不滿)，政治信任感的偏低將使領導在此政治環境中更難成功」(Hetherington, 1998:971-972)。

因此，政治信任感是政治系統賴以持續運作的重要基礎，不但強化權威當局的合法性，有助政治系統的穩定，也提供政府自由裁量的權力，提高行政效率，加速整體系統目標的達成。尤其在代議制的民主政治裡，除非執政者能獲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否則便不能順利推展各項政策與行動；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政府的各種作為將會遭遇質疑與阻礙，降低施政效率，甚至將無法穩定地掌握政權。

四、政治信任感的研究途徑

周進發(1986：13-21)曾歸納出政治信任感的四種主要研究途徑，茲將其資料摘要整理如下：

(一) 社會學研究途徑(sociological approach)。

此一途徑的學者強調個人的社會隸屬決定其政治信任程度，認

為政治信任感是個人社會背景因素的函數。主要的兩種研究假設，一是認為個人的社會階級會決定其政治信任感傾向，一是認為政治信任感是決定於個人的生長環境、種族、對宗教的依附程度等背景因素(Aberbach & Walker, 1970)。社會學研究途徑雖然使不少研究證明，不同群體的政治信任感程度間存有相當差異，但若趨於極端，成為社會決定論，不免失之偏頗。此外，在多元社會中，個人可能同時具備數種不同的背景因素，彼此間難免構成交叉壓力，使個人無法僅以某種單一社會因素作為信任與否的依據。因此對這種相關或關聯意義的解釋，必須特別謹慎。

(二) 社會心理研究途徑(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

此一途徑的學者強調政治信任感是個人一般態度或人格的一部分。研究政治信任感除了要注意直接關聯的政治因素外，還要顧及間接相關的非政治因素。主要的兩種研究假設，一是將政治信任視為個人心理剝奪感的函數：認為個人的心理剝奪感，除了會因為個人生活層次的匱乏而引發對政治的不滿外，也會造成個人自信心的缺乏，進而造成對政治的不信任(Abramson, 1977；引自周進發，1986)；一是將政治信任視為人際信任的函數：認為政治信任感是個人的一種人格特質反應，與政治考量無關，僅是人際信任中較特定的範圍，周進發在檢視人際變項與政治信任感的相關性後發現，人際信任程度越高，越相信官員的品德。社會心理研究途徑雖已注意到個人心理傾向，但研究變項往往較缺乏政治相關性，且測量技術不夠精密，使得其研究所獲得的結論相當紛雜。

(三) 政治社會化研究途徑(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pproach)

此一途徑的學者認為個人在生命過程中，隨著各種經驗的累積將逐漸建立其政治價值體系與政治態度，並進一步發展出對政治過程公平性或政策產出有效性的獨特看法(即政治信任感)。Easton(1975)便認為政治信任感能透過政治社會化過程而獲得。有鑑於此，政治學者乃結合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兩種途徑，改由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態度的相關理論出發，探討個人政治信任感的形成與改變。例如政治態度理論的「遠因說」與「近因說」，就曾被大量運用在探討政治信任感的起源上。因此政治社會化研究途徑是將政治信任感視為政治態度的一個類別，都是個人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學習結果。但如同 Almond(1960:27)所說：「政治社會化持續不斷進行，且貫穿個人的生命過程。」，因此若要完整的探討個人政治信任感的形成與轉變歷程，是否應選定對象進行長期的「縱的研究」？抑或有其他的研究方式？要如何設計有效的研究方法，將是採取此一途徑的研究者必須思考的難題。此外，政治社會化的機構眾多，個人可能同時受數個政治社會化機構所影響，在研究某機構如何形塑個人政治信任感時，要如何排除其他機構的干擾，亦須妥善考量。

(四) 公共政策途徑(public policy approach)。

此一途徑的學者認為人民非常關心政府制訂的政策以及執行過程，對於政府的執行能力也十分在意，而將政治信任感視為個人政策偏好或個人對政府表現評價的函數。Gamson(1968:178；引自周進發，1986)認為決策的本質以及決策的滿意程度是政治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尤其當不滿的情緒已經脫離特定政策的範圍，而及於其他一般化的政策時，此現象更為明顯。Muller 和

Jukam(1977:1589)也相信，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其實就是對公共政策產出的評價或對執政當局的行政能力表現同意或不同意的結果。而 Miller(1974a)在歸納多次實證研究後亦發現，人民對政策的滿意程度深切地影響他們對政府的信任態度。公共政策途徑主要雖是以人民對政府政策結果的評價作為政治信任感的重要解釋變項，但人民對政策的評價取向仍是建立於其心理特質以及對政治的基本態度上，無論個人是以政黨認同或政策偏好作為評價時的參考架構，勢必都無法脫離心理因素與政治態度傾向的影響，所以此一途徑與前三途徑並不抵觸。

(五) 傳播研究途徑(communication approach)。

此一途徑以傳播理論為基礎，主張大眾傳播媒體(mass media)除了具有告知的功能外，還有說服或影響的效果。傳播媒體對於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報導態度，勢必也會影響人民對政治人物或政府政策、能力、乃至形象的評價，進而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態度。此一理論也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如 Miller, Goldenberg & Erbring(1979)在研究報紙對人民信心的影響時，便發現閱讀批評性報導的頻率與政治不滿有顯著相關，即使控制教育程度和媒體暴露率(media exposure)兩項因素後，這種關聯仍然存在。此外，Robinson(1976)也發現，電視新聞的報導態度與人民的信任感密切相關，越信賴電視新聞記者的觀眾，對於人際與政治越缺乏信任。此一途徑將傳播媒體列入政治信任感研究的重要變項，在傳播媒體蓬勃發展、民眾普遍依賴媒體獲得外界資訊的現代社會中，更具意義；但此途徑所得的研究結果並非完全一致，有待進一步的驗證。

這些研究途徑提供了本研究幾點啟示：

1. 政治社會化研究途徑提示研究者，在探討政治信任感時，必須將個人置於社會系統中來看，將各種可能影響其政治信任感的機構列入探討範圍，不應侷限於個人變項。而傳播媒體為重要的政治社會化機構之一，因此本研究探討政治信任感與新聞媒體之相關性，亦符合此一研究途徑之論點。
2. 社會學研究途徑指出社會因素可能對其政治信任感造成影響，故本研究將受試者的性別、籍貫、家庭社經背景、政黨偏好等列為個人背景加以探討。社會學研究途徑同時也提醒，個人背景變項與政治信任感兩者的關聯性，可能因為個人變項間的交叉影響而產生偏誤，因此解釋與推論時應審慎為之。
3. 社會心理研究途徑強調政治信任感與個人心理特質的相關性，有不少研究即探討此關聯性((Aberbach & Walker, 1970；周進發，1986)，也獲得不少發現。筆者雖同意個人心理特質會影響其評斷世界的標準，進而影響其政治信任感，但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並不將個人心理特質列入研究變項之內。
4. 公共政策途徑主張，個人對政策的評價會影響其政治信任感的高低；本文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已將民眾對於公共政策的評價列入政治信任感的範圍中，因此亦符合公共政策途徑之論點。
5. 傳播研究途徑強調傳播媒體會影響民眾的政治信任感，因此本研究探討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之間的關聯性是可行且具有意義的。
6. 形成政治信任感的因素眾多，國內外的研究即發現主要因素有：政黨偏好、意識形態、對政策的評估、個人人格、與官員接觸經

驗、政治疏離感等 (Miller, 1974a; Easton, 1975; 周進發, 1986; 莊天憐, 2000)。本研究限於人力、物力與時間，無法作廣泛而長期的研究，僅針對筆者感興趣之變項加以探討，研究目的亦僅探討變項之間的關聯性，並不妄加斷定其因果關係。

由以上敘述可知，本研究是採政治社會化研究途徑為主，從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態度理論出發，研究政治信任感；並選定政治社會化的主要機構之一——傳播媒體，探討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的關聯性。為了使研究架構更加完整，參酌社會學研究途徑學者的主張，將受試者的性別、籍貫、家庭社經背景、政黨偏好等列為個人變項加以探討。

第三節 傳播媒體的效果

大眾傳播媒體提供人們生活所需的各種資訊以及娛樂內容，已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擴大民眾的視野，並在無形中影響其想法乃至行為。本節即欲了解傳播媒體的效果，首先介紹傳播媒體的概念，包括大眾傳播的意義、功能與效果研究之回顧，並將重點放在第二部分，闡述本研究之參考依據—議題設定理論。

壹、大眾傳播媒體的概念

一、大眾傳播媒體的意義

依據 Emery(1965:4) 等人的界定，所謂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是「傳播者應用已發展的媒體，向大多數的、不同的閱聽人傳遞消息、意見和態度。」。Janowitz(1968:41)則認為：「大眾傳播包含多種機構和技術，它經由特殊的社會團體，應用各種技術上的設計（如印刷品、影片、廣播等）傳遞符號內容給不同的、眾多而分散的閱聽人。」。而傳播學者對大眾傳播的定義，大多與 Lasswell 的名言：「誰說什麼，以何種管道傳遞給誰，具有何種效果。」(Who, say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相符合(引自余桂霖，1991：398)。

Lasswell 的名言足以說明大眾傳播具有五個要素：(余桂霖，1991)

1. 來源(source)或稱傳播者(communicator)：大眾傳播的來源為意見或訊息的傳送者。
2. 訊息(messages)或符號(symbols)：訊息可以是文字圖畫、符號

或聲音。這是傳播的內容，也是大眾傳播產生影響力的所在。

3. 管道(channels)：大眾傳播的管道即是「大眾傳播媒體」，學者一般把傳播媒體分為三大類：視覺媒體(如報紙、雜誌)、聽覺媒體(即廣播)、視聽媒體(如電影和電視)。其中又以報紙、廣播和電視三種管道最常為學者所研究。
4. 受眾(recipients)：即閱聽人(audience)。閱聽人是散佈於社會各個角落的不定量大眾，彼此的互動極小、缺乏組織性。對於多數的閱聽人而言，對抗傳播媒體的能力很微弱，只能選擇是否接觸，容易受大眾傳播媒體的操縱。
5. 效果(effect)或目的(destination)：大眾傳播的效果是指閱聽人接觸大眾傳播內容後，思想、態度和定向受到其影響或改變。

由此可知，大眾傳播媒體是從事大眾傳播的管道，藉由傳播媒體，大量的訊息與符號才能被傳達到閱聽人手中，並且對閱聽人產生影響。閱聽人雖不足以對抗媒體，但仍具有選擇媒體的能力，藉由選擇是否接觸來趨避媒體的影響。

二、 大眾傳播媒體的功能

傳播媒體的功能，亦可以 Lasswell(1948)所提，大眾傳播媒體的三個主要「活動」來說明(引自林東泰，1987：150-151)。

第一，媒體「守望」(survey) 社會環境：它蒐集、分配環境中所發生的訊息。媒體所呈現的，通常是當天被稱為新聞的訊息。

第二，媒體「解釋」(interpret) 環境，並且透過社論版，對社會上的各種問題提供適當的反應。

第三，媒體「傳遞價值」，媒體透過傳播社會價值觀與規範給社會

上的成員，把社會遺產代代傳承下去，亦即具有「社會化」功能。

社會學家 Wright(1975)則加上第四種功能－「娛樂」(entertain)，認為媒體提供的傳播內容具有娛樂效果。

本研究欲探討新聞媒體對於閱聽人的影響，因此特別重視媒體「守望」與「解釋」環境以及「社會化」的功能。

(一)、媒體的「守望」功能：

當人們生活的世界擴大到超出可以目視的範圍時，人們再也無法直接觀察所有事物，而傳播媒體適時的提供人們新聞，讓人們得知無法親自接觸、驗證到的事物及相關訊息(王國讚、黃旭立譯，2000)。但媒體在報導事件時，是經過「選擇」的，不僅選擇報導哪些事件，也選擇如何報導這些事件。

當媒體進行「選擇」時，是取決於該事件的新聞價值，以及媒體對於此價值的判斷結果。媒體在新聞內容的篩選與報導上，既已涉及了價值判斷，便無法以「中立」或「客觀」的立場，單純的向閱聽人報導或反映世界。媒體所呈現的，並非「真實世界」，而是「媒體所理解的世界」，亦即「媒體真實」(media reality)(蔡明燁譯，2001)。

(二)、媒體的「解釋」功能：

媒體的解釋功能不僅侷限於社論，凡針對某特定事件所作的分析文章或是對政府新政策的評論，皆屬於解釋功能的範圍，甚至在報導事件時便涉入了它們對事件的解釋與觀點。但必須注意的是，媒體的解釋並不一定是正確的，而且容易使個人過於依賴媒體的評論而失去自己評論的能力(王國讚、黃旭立譯，2000)。

民眾過於依賴媒體的評論來理解世界，對社會來說可能是一個潛藏的危機。如果媒體對社會事實做偏頗失真的解讀，或以煽動性字眼鼓動民眾，個人又無法辨別真假，此時個人的認知與事實將有相當大的差距，無法針對事實作出正確的判斷，如果此時群眾情緒又被挑起，則群眾運動或社會衝突將難以避免。

(三)、媒體的「社會化」功能：

媒體不僅是外界訊息的主要來源，為人們形塑了社會真實的種種意涵與圖像，同時也是建構和表達社會價值觀的重要機構。人們藉由接觸媒體的內容，便可了解各種角色的社會期望，學習合乎規範的行為模式，媒體的社會化功能顯而易見。Wright(1959)就曾指出，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從媒體中獲取社會規範，其中某些規範甚至可能一生影響其行為(引自張妮秀，1982)。

政治學者越來越重視媒體此一機構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所能發揮的影響力，國內學者陳義彥(1977:275)便認為大眾傳播媒體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媒體的「守望」、「解釋」、「社會化」功能雖可使我們獲知媒體在社會中的重要性，但如要更清楚的了解媒體究竟對閱聽人造成了哪些影響與效果，就必須從傳播媒體的理論與相關研究進行探討。

三、大眾傳播的效果研究

「大眾傳播的功效」一直是傳播學者研究的焦點，此一議題的研究可大致分成若干階段。茲將各階段效果研究的重要主張摘述如下：

第一階段：萬能的傳媒

本世紀初到 1930 年代末的傳播學者大都相信媒體「可能具有無窮的力量」，「皮下注射說」(hypodermic needle model)即為代表理論。此一效果研究認為，媒體(尤其是廣播)的力量無所不能、無所不在，閱聽人是盲目、受牽引的，只能依循媒體灌輸的想法行事(簡妙如等譯，2001)。傳媒被認為擁有形成輿論和信念、改變並塑造行為模式的重大力量。

第二階段：強大傳媒理論受到檢驗

從 1930 年代開始，陸續有學者開始質疑傳媒效果萬能論，而 Lazarsfeld(1944)等人提出的「兩級流通理論」(two-step flow hypothesis)更是對媒體萬能論的重大挑戰(彭芸，1986)。

到了 1950 年代，媒介「效果有限論」(limited-effect model)代之而起，主張媒體效果是受個人心理、社會因素制約的。大眾傳播通常必須經過一連串的中介因素才能對閱聽人發揮作用。媒體在形塑閱聽人態度與行為上，仍被視為重要因素，但達成的效果卻是有限的。(簡妙如等譯，2001)。

「效果有限論」一直受到懷疑與挑戰，有大量的長期研究證據可證明，傳媒具有重大效果。Neumann(1983)就認為「效果有限論」已不適用於今日的傳播研究中：

1. 早期的研究只著重短期效果，今日的研究則注重長期的累積成效。
2. 早期的效果研究只注重印刷媒體，今日的效果研究已包含其他不同種類的媒體。
3. 早期只重視態度與行為的觀察，今日的研究則在測量個人對社會環境認知的改變程度。

針對學者在 1960 年代以前的效果研究，大致可歸納出幾個特點：第一，較少探討傳播組織與傳播者的問題，而多集中於「效果」的研究與爭論；第二，不管是早期的「傳媒效果萬能論」或後期的「傳媒效果有限論」，焦點均侷限於閱聽人態度與行為的改變上，卻忽略了最基本也最可能發生的「認知效果」，故未能展現出傳媒效果的全貌；第三，著重立即明顯的效果，使得研究方法偏向橫斷法的研究，但媒體除了有短期、立即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擁有對個人長期、潛移默化的影響(潘家慶，1988)。

第三階段：強大傳媒的再發現

到了 1960 年代初期，媒體效果再度受到重視。但此時期的研究，已脫離了早期效果研究粗糙的刺激—反應模式，研究者引入大量的變項，試圖藉此推論和了解媒體的長期效果。例如，研究者會考量媒介使用與其動機的社會文化脈絡，以及形成團體身分認同的社會因素，如性別、社會階層、意識形態等。此外，更探討傳播行為的先在因素，如閱聽人的需求與動機，此即「使用與滿足說」的提出與討論。

此時期更大的轉變是，研究重心由態度的改變，轉變為認知結構的研究。研究者多把重點放在媒體是否對閱聽人所認知的真實世界造成影響，此類研究中最重要理論就是「議題設定」的提出。議題設定理論研究「外在世界」、「媒體」、「人們腦海中的世界」三者的關聯，發現傳播媒體並非將世界真實呈現給人們，而是透過其「守門人」的功能，以選擇性的方式將部分外在世界的事件報導出來，因此媒體可以為人們塑造真實世界(彭芸，1986)，影響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認知。

因此本時期認為媒體的功效，並非「無所不能」，也不是「有限的

加強功能」，媒體對閱聽人的認知結果能發揮影響力，但成效如何需視媒體與閱聽人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定。

「議題設定理論」(agenda-setting)於1970年代提出，重新檢視媒體效果，主張媒體所強調的議題與閱聽人重視的議題之間具有重大的關聯性，並將效果研究重心轉移到媒體對閱聽人認知層面的影響。不少學者將議題設定視為傳播理論的重要概念，本文亦將對此一理論深入探討，以進一步釐清媒體與個人政治取向的關聯性。

貳、議題設定理論

議題設定理論的原始概念來自於Lippmann(1922)在「民意」(Public Opinion)一書所提出的「腦中圖像(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Cohen(1963)的一番話則簡潔說明了議題設定的概念：「新聞或許無法告訴讀者想什麼(what to think)，卻可告訴讀者該想些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McCombs & Shaw, 1972:77)。到了1972年，議題設定理論架構才由McCombs與Shaw正式提出。

Lippmann的主張，亦被稱為「媒體建構社會真實論」，欲探討議題設定理論，應先從媒體建構真實論談起：

一、媒體建構社會真實論

Lippmann認為真實世界對一般人而言太過龐大而複雜，人們無法直接去認清理解，因此必須建構出「腦中圖像」，以較簡單的模式來認知與處理各種人事物(引自韓智先，2000：1)。Lippmann認為人們可

以直接經驗到的事物相當有限，對於公共性事務通常僅有一個模糊的概念，而大多數與個人切身相關的事務也遠超出個人的直接經驗範圍之外，因此個人必須透過媒體的報導以及自己的想像，去了解外在世界。長久下來，媒介便塑造了個人的「腦中圖像」，替個人建構了腦海中的社會現實(即媒體真實)，個人對許多事物的解釋，只能透過媒體所塑造的符號世界去理解。Lippmann 的概念提出了兩個重點：一是個人對外在事件的想像充滿了主觀與臆測；二是媒體對於事件的報導並不等於事件的真相，媒體真實與社會真實之間確有差距存在。

Lippmann 認為媒體的主要功能在於為人們建構所謂的社會現實，透過這種日積月累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民眾在理解外界事務上將不加深思地立即反應。但人們透過媒體建構的社會圖像去理解真實世界，也容易造成對於事實的誤解與扭曲(引自呂弘毅，1992)。

在傳播科技發達、媒體普及的現代社會中，忙碌的人們更依賴傳播媒體作為政治訊息來源的主要管道(金傳聰、沈慧聲，1998)，對於媒體傳遞的訊息內容也無心查證，因此無所不在的媒體在創造「外在世界於個人的腦中圖像」上，其影響力恐怕將比 Lippmann 當時的媒體更為強大。

二、議題設定理論

McCombs 與 Shaw 於「大眾媒體之議題設定功能」(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中指出，媒體在選戰中不僅設定選舉議題，也影響選民對這些政治爭論點的重視程度，傳播媒體所報導的重點，與閱聽人腦海中認為的重要社會議題間，有一強而正面的關係(McCombs & Shaw, 1972)。媒體加強報導的題材與事件，會影響人

們對這些題材與事件的重視程度(韓智先, 2000: 1)。兩人的論點構成了議題設定理論的主要概念, 並廣泛運用到選舉研究上。

議題設定理論的面向有二:

(一) 議題設定由媒體與閱聽人的相關因素組成:

1. 媒體方面: 指的是傳播媒體的守門人功能, 媒體守門人在新聞部、編輯部, 將蒐集到的訊息進行選擇、過濾與重製, 為閱聽人「建構社會真實」。
2. 閱聽人方面: 閱聽人基於本身興趣或知識需求, 同時為減低環境的「不確定性», 而產生「引導需求」(need for orientation), 促使閱聽人主動尋找某事件的訊息。

(二) 議題設定具有社會學與心理學意涵:

1. 就社會學意涵而言, 議題設定是一種社會學習過程, 透過這種學習, 閱聽人每天從媒體訊息中自然地學得一些重要議題。
2. 當某議題的資訊與個人的相關性很高, 個人也對此議題深感興趣, 此時如果個人知識不足, 又處於不確定的情況時, 個人對該議題相關資訊的需求便會提高, 越可能運用媒體尋找資訊以滿足需求, 此時的媒體也越容易發揮「議題設定」影響力(翁秀琪, 1998)。

由以上所述可知媒體的主要效果在於認知, 而這種「議題設定」的認知效果, 常是閱聽人無意中且長期的建構效果。不論媒體業者是否承認, 媒體確實經由不斷提供訊息, 再透過日積月累的議題設定功能, 在不知不覺中建構閱聽大眾的認知。因此媒體不僅影響個人對社會議題的重視程度, 也影響個人對於社會真實的認知(廖述銘, 2002)。

議題設定理論發展到 90 年代, 研究方向逐漸由「議題本身

(objects)的顯著性」轉移到「議題屬性(attributes)的顯著性」。McCombs(1995)並將議題設定功能區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功能即傳統的議題設定功能，關心媒體所報導的主體在腦中圖像的顯著性(what to think)；第二個層次的設定功能則是新的研究焦點，是指屬性在腦中的顯著性(how to think)(引自陳憶寧，2001：117)。每個被媒體報導的主體都有無數個屬性、特質或特性，媒體對這些屬性的報導方式或結論，往往也會形塑閱聽人對此一主體的認知，使人們看見這個主體時，便會想到這些特定的屬性，而對主體形成一既定的形象。

McCombs(1995)強調，媒體所產生的形象設定效果，主要顯現在實質內容與情感兩方面。前者是指，媒體如果長期強調報導某位候選人的某些特定屬性，則當選民想到此一候選人時，這些屬性就會浮現在選民腦海中，成為對該候選人形象評估的依據。後者則是指，媒體對某候選人的某些屬性或特色，是採取正面、負面或是中性的報導，將會影響到選民對該候選人這些屬性的好惡評估(引自岳蕙蘭，1998：6)。

這樣的觀念應用到民眾對政府與政治人物的信任與評價，意思就是，當我們想到政府、政策或政治人物時，媒體長期報導政府、政策或政治人物的某些特定屬性(如服務熱忱、專業能力、施政表現等)就會浮現在腦海中，成為我們評估政府、政策或政治人物的依據，進而影響到我們對這些屬性的正面、負面或是中性的評估。

三、影響議題設定效果的因素

Winter 曾整理了相當數量有關議題設定的實證研究，發現研究之間有互相矛盾之處，有些認為新聞媒體有極顯著的議題設定功能，有些則認為沒有。因此 Winter 於 1981 年提出「條件情境」(contingent

condition)的概念，認為在社會與媒體、個人互動的大環境下，媒體並非民眾事務資訊的唯一來源，必須引入其他的變項，才能進一步探討在不同的條件情況下，民眾受到媒體議題影響的程度。Winter 並將「條件情境」，亦即「會影響議題設定的效果的不同因素」分為媒體特性和閱聽人特性兩大類。

- (一) 在媒體特性方面，Winter(1981)提出幾項值得思考的因素：1. 議題與閱聽人的切身性：與閱聽人較疏遠而缺乏切身關係的事件，新聞媒體會有較大的議題設定效果；閱聽人較切身相關且能接觸到的事件，新聞媒體較缺乏議題設定效果；2. 媒體的性質與內容：不同種類的媒體、不同的媒體內容，具有不同的媒體設定效果；3. 議題的鄰近性：全國性與地方性議題，媒體的議題設定效果有差異；4. 媒體對該議題報導的時間長短等因素。
- (二) 閱聽人特性方面，Winter(1981)也提出幾項可能的相關因素，例如：1. 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都可能影響媒體的議題設定功效；2. 媒體使用情形；3. 人際討論；4. 人格特質(引自廖述銘，2002)。

由 Winter 的條件情境可知，媒體雖具有議題設定功能，但議題設定功能會受到許多內外因素影響，我們不可輕易斷言各種傳播媒體均能發揮議題設定功能，並對所有閱聽人造成相同的議題設定結果。

四、議題設定理論的啟示

個人依賴媒體來瞭解外在世界，但媒體不可能將世界的全貌完整呈現在閱聽人面前，媒體並非真實呈現社會本來面目的「鏡子」，反倒像是「探照燈」(spotlight)，讓我們的目光聚集在某些議題上，而未被報導的政治消息則仍深處於黑暗中，未能獲得民眾注意(王興田，2000:51)。新聞媒體能影響閱聽人對於議題的認知程度，並進一步「引爆」(priming)社會大眾對某些議題的關注。

透過政治訊息的報導，媒體不但強化了民眾對於政治議題的認知關注，也使民眾更加瞭解政治運作的現況、政治人物的表現以及政府的各項政策，也使民眾能有效監督政府並做出正確的政治判斷。

正如 C. Wright Mills(1981)所指出的「……人是活在第二手的世界裡……。人類生活的品質，是由從外在他人所獲得的意義來決定」(引自蔡明燁譯，2001:5)。媒體所塑造出來的社會情境也影響我們對於生活品質、社會現況的判斷。民主國家中的媒體報導、評論政策消息與政府作為，提供各種新聞事件的「真實」狀況給人民，人民再依此判斷利害因果，形成對執政當局的印象，並逐漸影響民眾對政治環境的看法、對政府與政治人物的評價。

但是媒體是將各種訊息經過選擇、過濾、重組等關卡後，才能製作成新聞呈現在閱聽人面前，而在種種關卡中經常會受到政治力量、假事件、新聞記者本身的價值判斷或採訪模式所左右(王興田，2000)。因此，新聞提供的片斷真實，加上媒體在報導時各種可能的偏差，就可能使人民心目中的政治情境與實際狀況產生極大的落差。

新聞媒體如能善盡「第四權」的權責，公正持平地報導政治議題，可提供民眾監督與參與政治所需具備的資訊與認知，協助民眾對政治

情境做出公允正確的判斷與評價，有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但如果媒體在報導政府運作、政治人物或政策時，僅偏重報導負面訊息，那麼民眾所感受到的政治環境也將是負面的，降低民眾對於政府、政策與政治人物的評價與信任感，甚至作出錯誤的政治判斷。

議題設定功能強調新聞媒體對於民眾的社會認知乃至印象、評價具有重大影響；而透過政治新聞的報導，民眾對於政治情境、政府運作的認知與評價亦將受其牽引，並可能影響民眾對於政治的支持與信任程度。但媒體是否能發揮議題設定功能，還須許多內外在條件的配合(Winter, 1981)，因此，本研究僅探討新聞媒體與政治信任感之關聯性，而不妄加論斷兩者之因果關係。

第四節 政治信任感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 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台北市高中生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之相關性。影響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的因素很多，在閱讀相關理論與研究文獻後，決定以個人背景因素作為自變項，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為依變項，探討個人背景是否對台北市高中生之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造成影響；此外並探討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之間的相關性。

壹、個人背景因素與政治信任感

過去國內在研究政治信任感時，大多發現民眾對於政治抱持較信任、支持的看法(周進發，1986；段盛華，1988)；但近年來大部分的研究卻發現民眾的政治信任感僅有中等偏低的程度(古珮琳，1997；陳文俊，1998；葉佳文，2001)。國外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Rosenstone & Hansen, 1993；Hibbing & Morse, 1995；引自 Hetherington, 1998)。

政治信任感的研究者常將性別、種族或籍貫、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社會地位、所屬政黨或政黨支持傾向等列為重要的個人背景因素加以探討。本研究之對象為高中一、二年級學生，年齡大致相同，又因其學生身份，沒有職業、收入、社會地位等問題，故個人背景因素僅採性別、籍貫、家庭社經地位與政黨支持傾向四者。

茲將個人背景因素與政治信任感之研究文獻整理如下¹。

註 1：關於個人背景因素與政治信任感之國內相關文獻彙整請參見附錄一。

一、性別與政治信任感

傳統的父亲系社會中，性別刻板印象普遍存在，大人們要求男生應有的人格特質迥異於女生，男女生自小就被以不同的方式與標準來教育，因此基本人格、對世界的看法以及對政治事務的興趣、評價方式自然也存有顯著差異。近年來隨著社會的多元，兩性平等的觀念普及，家長與教師對於男女生的教育方式與要求日趨一致，男女生對於政治事務的興趣、看法與評價是否仍存有顯著差異？此問題可由國內外不同的研究結果推知一二。

不少研究發現性別會造成政治信任感的差異：Sidelnick(1986)研究美國九、十二年級學生，發現女生對政府的尊重(政治信任)皆高於男生(引自古珮琳，1997：44)。

Milbrath(1976)研究政治參與時發現，男性的政治信任感低於女生(引自劉行健，1989：33)。

辜淑琴(1985)研究政治社會化機構對台北市公民政治態度的影響發現，女性對政府官員的政治信任感高於男性。

周進發(1986)針對嘉義市選民的信任程度與選舉行為研究時發現，性別對於政治信任感造成的影響並不一致。在政策信任態度上，男性高於女性；但在對官員能力的信任態度上，女性高於男性；而在官員品德的信任態度，兩性間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段盛華(1988)研究五專學生，發現男生的政治信任感低於女生。

林嘉誠(1989)研究二十歲以上的台北市民之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為時發現，女性對政策的信任感明顯低與男性，但對政府官員信任感則無顯著差異。

張雪君(1995)研究國小學生的政治社會化成效，發現男生的政治

信任感高於女生，但不顯著。

劉秋霞(1998)研究國中教室氣氛與學生政治態度時發現，男生的政治信任感較女生為高。

亦有研究發現性別並不會影響政治信任感：Baik(1994)研究韓國國小高年級及國中一二年級、高中一二年級學生，發現男女生在政治信任感上並無顯著差異(引自古珮琳，1997：44)。

王錦雀(1995)研究公民教師的政治態度與行為，認為男女公民教師在政治信任感方面並無顯著差異。

曾俊傑(1995)以專科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男女生的政治信任感並無顯著差異。

古珮琳(1997)在研究桃園地區高中職學生的政治態度時亦發現，性別並未造成政治信任感傾向的差異。

由以上研究可發現，性別因素對於政治信任感的影響未有定論，隨研究者所選取的對象、年齡、研究地區的不同，所得結論並不完全一致。不過早期研究傾向於女性的政治信任感高於男性，近年來則發現性別對政治信任感造成的差異不大。

二、籍貫與政治信任感

籍貫代表的不僅是個人的身分屬性，不同族群(籍貫)對於世界可能有不同的認知，對於政治事務的看法亦可能有所差異。過去在台灣，籍貫的差異曾造成政治上的衝突，二二八事件更在本省人與外省人間劃下難以抹滅的界線，政府在政治上封閉參與的政策造成的省籍對立以及錯誤的語言政策造成之隔閡，均強化了族群的象徵意義(王明珂，1991)，因此不同籍貫的民眾對於同一政治事件，極可能有迥然不同的

解讀與判斷。為了消弭省籍問題，政府近年來也做了許多努力，例如公開為二二八事件道歉、政治參與的開放(古珮琳：1997：46)等，籍貫因素對政治信任感的影響是否減少，或許由國內的研究可窺其端倪。

不少研究發現籍貫會造成政治信任感的差異：彭懷恩在研究大學生的政治支持時，發現外省籍學生的政治信任感高於本省籍學生(彭懷恩，1978)。

辜淑琴(1985)發現，外省籍民眾對政策的信任高於本省籍民眾。

周進發(1986)則發現籍貫對政治信任感的影響並不一致：在政策信任上，本省籍明顯低於其他省籍選民；但在對官員能力的信任態度上則相反，不過此項在排除政黨干擾因素後，又變成本省籍低於其他省籍選民；在官員品德的信任態度，省籍的不同並未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段盛華(1988)的研究發現，外省籍五專學生的政治信任感明顯高於本省籍五專學生。

林嘉誠(1989)的研究發現，外省籍民眾的對官員信任感與對政策信任感均明顯高於本省籍民眾。

劉行健(1989)研究計程車司機的政治態度時發現，省籍不同會造成政治信任感的差異。

陳文俊(1997)研究大專學生的政治態度時發現，不同族群的政治信任感呈顯著差異。

亦有研究發現籍貫並不會影響政治信任感：張明垣(1985)針對高雄市國中生的研究發現，不同籍貫學生對於政府的情感(政治信任感)並無顯著差異。

黃麗秋(1988)亦發現，省籍並未造成選民對政府評價的差異。

張雪君(1994)發現，籍貫因素並不會造成學生政治信任感的差異。

王錦雀(1995)的研究指出，公民教師的政治信任感並不會因籍貫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古珮琳(1997)亦發現籍貫並未造成政治信任感傾向的差異。

劉秋霞(1998)研究也指出族群並未造成政治信任感的顯著差異。

葉佳文(2001)針對桃園地區高中職學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發現，父親籍貫與政治信任感呈顯著差異。台灣籍原住民的政治信任感最高，大陸各省籍最低，迥異於先前之研究。

由以上研究發現，籍貫因素影響政治信任感亦非必然，早期研究結論傾向於外省籍民眾的政治信任感明顯低於本省籍民眾，近年來則發現省籍對政治信任感造成的差異並不明顯，此一現象或許和政府開放政治參與、逐漸重視各族群文化有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葉佳文(2001)於民進黨執政後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大陸各省籍的高中職學生具有的政治信任感低於其他籍貫學生，此結果是否與政黨輪替有關？希望能由本研究進一步獲得驗證。

三、家庭社經地位與政治信任感

在過去階級地位分明的傳統社會中，社會階層深刻地影響人們的各個生活層面，包括生活水準、價值觀念、言行舉措、甚至對世界的解讀方式與對政治事件的評斷角度等。在現今的民主社會裡，雖已無社會階級制度，但是社會中不同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的人們，生活層面仍存有諸多差異；亦即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們，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可能影響其對政治世界的認知與看法，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家庭社經地位對於政治信任感的影響力，既有的研究結果如下：

不少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會造成政治信任感的差異：張明垣(1985)指出中產階級的軍公教家庭，學生對政府的情感(政治信任感)明顯高於其他。

林嘉誠(1989)發現，教育程度越高，對官員與政策的信任感越低；主觀社會階層與職業等級越高，對官員信任感越低。

陳秋燕(1994)發現不同社經地位的國中學生，對政府的情感具有顯著差異：社經地位越低，對政府的情感越正向積極；社經地位越高反而越不信任政府。

張雪君(1995)比較高、中、低社經地位階層的政治態度發現，低社經地位學生的政治信任感最高，且明顯高於中社經地位階層者。

古珮琳(1997)的研究中亦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越高，政治信任感越低，兩者呈顯著負相關。

周進發(1985)則發現，主觀社經地位不同的選民在四種信任態度上並未有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研究可發現，家庭社經地位與政治信任感之間似乎呈現負相關，但是相關研究結果不如其他個人變項豐富，因此本研究亦將家庭社經地位納入，希望進一步驗證家庭社經地位與政治信任感之相關性。

四、政黨支持傾向與政治信任感

在民主國家裡，政府是由政黨經由選舉勝利取得執政權之後所組成，因此支持或加入該政黨的民眾，對於該政黨所組成的政府、官員以及制定的政策應該會有較高的信任程度。

但根據國外相關研究指出，政治信任感與參加政黨行為的相關程

度並不一致：

Citrin(1974:976-978)在研究 1964 年至 1972 年的三屆總統選舉，歸納研究結果後指出，政治信任感與政黨認同有關。

Miller(1974a:960-964) 研究指出，美國公民之中，政治不信任感偏高者，多數對民主黨與共和黨均不滿意，共和黨執政時，民主黨黨員政治不信任感偏高，反之亦然。

Renshon(1974) 則指出，美國人民政治不信任感與參加政黨行為成負相關，亦即參與政黨行為越積極者，政治信任感越高。Ambler(1975) 研究發現，法國左派政黨黨員，政治不信任感較右派政黨黨員高(引自林嘉誠，1989，271-272)。

以國內研究而言，大致均發現政黨支持傾向會造成政治信任感的差異：

周進發(1986)發現，不同黨籍的選民在對官員品德的信任態度上無顯著差異；在政策信任上，認同於黨外的選民明顯低於國民黨籍者；在對官員能力評價上，認同於黨外的選民明顯高於國民黨籍者，但此種差異僅存在對議員能力的評價上。

黃麗秋(1988)研究發現，政黨偏好造成選民對政府評價的顯著差異，政黨偏好偏向黨外之選民對政府的評價，明顯低於偏國民黨及中立者。

段盛華(1988)研究五專生政治社會化效果後發現，在野黨的支持者或黨員，對政治系統的支持、信任與評價感情，顯著低於執政黨的支持者或黨員。

劉行健(1989)指出，政黨偏好不同，政治信任感不同。

莊天憐(2000)在歸納 1989-1999 的選舉研究後即指出，國民黨的

支持者對於政治的信任感高於在野黨的支持者，選民會將自身對政黨的喜惡反映到對政治的信任感上。這或許就是過去國民黨長期執政的環境下，國民黨支持者的政治信任度明顯較高的原因。

葉佳文(2001)的研究則發現，父母皆支持民進黨的高中生，政治信任感最高。

綜合以上研究可發現，早期國民黨一黨獨大，因此研究者多將政黨變項劃分為國民黨與非國民黨(黨外)，發現結果也大多是偏向國民黨者的政治信任感明顯高於非國民黨者。即使後來民進黨等政黨陸續成立，但國民黨支持者的政治信任感亦常遠高於其他政黨的支持者。僅有葉佳文(2001)的結論迥異於先前研究，而這或許是因為該研究於民進黨執政時期進行有關。由於民進黨、台聯與國民黨、親民黨、新黨之間在不少問題上認知差距頗大，意識形態也不同，因此筆者預期政黨支持傾向將會造成政治信任感傾向的顯著差異。

綜合上的討論可知，性別、籍貫、家庭社經地位、政黨支持傾向與政治信任感之間的相關性雖尚無一致之看法，但是探討政治信任感時，這些個人背景因素仍具有研究上之價值，應該列入研究變項中探究。

貳、個人背景因素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

根據內政部在 1999 年的資料亦顯示 12-18 歲的青少年有 70% 是每天接觸電視節目（引自李昶儀，2001）。至於本研究欲了解的高中生對於新聞媒體的使用情形，葉佳文(2001)研究桃園地區高中職學生政治社會化時發現，收看電視新聞報紙的高中職學生比例相當高，分別達 87.2%與 79.8%，收看網路電子報者則僅有 37.9%，顯示高中職學生收看電視與報紙兩種新聞媒體的情形相當普遍，收看網路電子報者仍佔少數。岳蕙蘭(1998)針對全國大一學生的進行的媒體使用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

在傳播行為研究上，個人背景因素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有學者指出，自 1950 至 1979 年間，超過三分之一的媒體使用研究，僅以個人背景因素作為比較的重點(Poindexter, 1979；引自劉行健，1989：28)，故本研究亦將個人背景列為影響新聞媒體閱聽行為的重要變項。

茲將個人背景因素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之相關研究整理如下²：

一、性別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

早在 1944 年，Lazarsfeld 等人所做的選舉研究中即指出，男性對於政治媒體的接觸較為頻繁（引自劉行健，1989：28）。

Dowse 和 Hughes(1971)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高達 89%的男孩表示經常收看電視新聞，然而僅有 25%的女孩如此表示（引自張士政，2000：24）。

國內研究部分，楊孝滢(1978)在研究台北市民傳播行為與政治態

² 關於個人背景因素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之國內相關文獻彙整請參見附錄二

度、政治認知關聯性時發現，性別與看報紙之習慣、注意選舉相關新聞均有顯著關聯，男性明顯高於女性。

林嘉誠(1989)發現，男性的政治消息傳播行為(包括新聞媒體接觸)較為積極。

曾俊傑(1995)則發現性別對媒體閱聽行為的影響並不一致：男性在使用傳播媒介頻率上，明顯高於女性，但對媒體的接受不因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翁秀琪、孫秀蕙(1995)於民國 82 年縣市長選舉前所進行的研究發現，男性選民的新聞媒介使用分數比女性高出許多，顯示男女選民在新聞媒體使用上的確有顯著差異。

孫式文(1997)以嘉義市和民雄鄉的居民為樣本，調查傳播媒體在首屆省長選舉中對選民的影響，結果發現，男性較女性更注意報紙的選舉相關新聞。

劉恩良在 1998 年時曾以公共事務的媒體注意程度與暴露程度構成的政治媒介使用因素，檢驗媒體對於男女青少年政治化之影響，其研究發現男孩比女孩較常使用政治(新聞)媒體(劉恩良，1998)。

彭芸(2001)針對 2000 年總統選舉之合格選民，研究其媒體使用與選後信心後發現，在收看有線電視選舉新聞上，男性收看較多，也較注意無線電視台的選舉新聞注意。

由文獻中可看出，大多數的研究結果均顯示性別對於新聞媒體越聽行為確實造成了顯著的影響，且男性的閱聽行為較女性為積極。本研究將性別納入個人變項中，以了解在高呼兩性平等的現在社會裡，男女高中生的新聞媒體閱聽行為是否仍有顯著差異。

二、籍貫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

辜淑琴(1985)發現，籍貫與大傳媒介政治社會化達顯著差異。外省籍民眾的大傳媒介政治社會化程度高於本省籍。

林嘉誠(1989)發現，外省籍民眾的政治消息傳播行為較本省籍民眾積極。

孫式文(1997)發現，省籍可明顯預測電視新聞的使用。外省人比本省人更常收看電視新聞，更注意與選舉相關的電視新聞。

許禎元(1999)在影響媒體使用對政戰學校預官班學員的民主價值取向影響時發現，省籍與看電視新聞量、看報紙量具有顯著相關。

以上四份文獻中顯示，外省籍民眾使用新聞媒體的程度高於本省籍民眾，但因為相關研究較少，故不宜妄加推論此一現象。籍貫對於本研究的「政治信任感」而言，為一重要的影響因素，故將籍貫列為自變項，一併討論籍貫是否對新聞媒體閱聽行為造成影響。

三、家庭社經地位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

Rogers(1976)曾指出，社經地位是媒體暴露的因素之一：社經地位高的人，接觸媒體的頻率與時間量明顯較高(引自曠湘霞，1984：158)。

楊孝滢(1978)發現，父親教育程度、每月收入與看報紙之習慣顯著相關；父親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低之民眾的看報紙習慣較積極。

辜淑琴(1985)發現，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個人大傳媒介政治社會化程度越高。

許禎元(1999)發現，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員，看電視新聞量與看報紙量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的家庭政治社經地位是由父母的教育程度與職業等級所構成，而由上述文獻似乎可推論家庭社經地位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具有相關性，因此本研究於探討家庭社經地位與政治信任感之關聯性的同時，亦將驗證家庭社經地位是否造成新聞媒體閱聽行為的差異。

四、政黨支持傾向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

辜淑琴(1985)發現，個人黨籍與大傳媒介政治社會化達顯著差異。國民黨員的大傳媒介政治社會化程度高於非國民黨員。

林書妣(1992)針對國營事業主管傳播行為與政治態度之研究發現，參加政黨不同，看電視新聞的頻率呈現差異：國民黨籍高於無黨籍者。且參加政黨不同，電視傳播行為與對媒體的信任程度皆有差異。

翁秀琪與孫秀蕙(1994)以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所進行的研究亦發現，具有不同政黨偏好的選民，在媒體使用分數上有所不同。

孫式文(1997)發現，政黨認同是預測報紙使用的重要變項，具有特定政黨屬性的民眾，較常閱讀報紙，也較注意報紙的選舉相關新聞。

許禎元(1999)發現，學員所屬政黨與其電視新聞、報紙接觸時間具有顯著相關。

彭芸(2001)則指出政黨認同可顯著預測無線電視新聞的收視。

由以上文獻可知，政黨傾向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之間具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因此本研究亦將探討政黨支持傾向與高中生新聞媒體閱聽行為之間的相關性。

綜合以上討論可知，性別、省籍、家庭社經地位、政黨支持傾向等背景因素對於個人的新聞媒體閱聽行為會造成輕重不一的影響。本研究已將此四個背景因素列為自變項，故在驗證背景因素對政治信任

感所造成的影響時，亦將探討背景因素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之關聯性。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研究在測量「媒體使用」時，多半只是測量受訪者的媒介暴露程度(the degree of media exposure)來探討媒體的影響力。但傳播學者 McLeod 和 McDonald(1985)指出，此類的研究應該要加上對媒體內容的「注意程度」(attention to mass media contents)，而非僅有測量接觸的時間或頻率(引自彭芸，2001)。Chaffee 和 Schleuder(1986)亦強調，除了測量閱聽人使用媒體時間長短作為媒體暴露程度指標外，測量閱聽人「注意程度」更形重要，此論點在其他研究上也被引用並獲得證實(翁秀琪、孫秀蕙，1995；孫式文，1997；劉恩良，1998；彭芸，2001；張卿卿，2002b)本研究在探討受試者對新聞媒體的使用時，主要即是測量其媒介暴露程度與媒體注意程度。

此外，本研究的目的亦在探討新聞媒體與政治信任感的相關性，欲探討媒體對於閱聽人的影響力，就不能只考量媒體的使用程度。個人對於媒體的信任程度越高、越接受媒體所報導的內容與論點，媒體對個人的影響力也越加深遠(Denton & Ward, 1985；引自許禎元，1999)，因此在不少研究中均把對媒體的信賴程度或接受度一併列入媒體變項中加以討論(段盛華，1988；林書玘，1992；曾俊傑，1995；岳蕙蘭，1998；陳文俊，1998)，本研究亦把新聞媒體接受納入閱聽行為變項中，探討高中生對於新聞媒體政治性報導內容的接受程度與其政治信任感傾向之間有無關聯性、是否因個人背景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為了更清楚地了解台北市高中生的新聞媒體閱聽行為，故將高中生選擇新聞媒體時的考慮因素亦納入媒體變項中，命名為「新聞媒體選擇」。歸納上述分析，本研究的新聞媒體閱聽行為，主要是探討受試

者的新聞媒體使用(包含新聞媒體暴露與新聞媒體注意)、新聞媒體接受與新聞媒體選擇。

參、政治信任感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

早期與政治相關的媒體閱聽研究大多是探討選民在選舉期間對於媒體的使用情形，是否會影響其投票的動向，後來的學者才將媒體研究擴及非選舉期間，並將探討的面向加廣，將政治社會化、政治態度等議題納入媒體研究範圍。茲將相關研究的重要發現臚列於下³：

不少研究發現政治信任感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具有顯著相關性：

Fowlkes(1974)強調：在影響高中高年級學生政治信任感的形成上，傳播媒體與學校教育同為最重要的媒介(引自蔡璧煌，1994)。

Robinson(1976)觀察 1960-1970 年代初期的美國電視新聞與政治情勢後指出，當時的記者刻意營造一種對政府效率不信任以及對政治體系不滿的氣氛。Robinson 同時發現，越信賴電視新聞記者的觀眾，對於政治越缺乏信任。

Miller(Miller, Goldenberg & Erbring)等人研究報紙對人民信心的影響時，發現閱讀批評性報導的頻率與政治不滿顯著相關(1979)。

Inkeles(1969)的研究指出，奈及利亞人民的政治信任感與政治傳播行為呈現負相關(引自林嘉誠，1989)。

國內的研究方面，段盛華(1988)發現，政訊報導接觸越多者，對於政府及政策的評價較低，對於政治系統亦較不支持。

林嘉誠(1989)發現，對官員信任感以及對政策信任感兩者，與政

³ 關於政治信任感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之國內相關文獻彙整請參見附錄三。

治消息傳播行為之間均達顯著負相關，亦即政治信任感越高，政治消息傳播行為越低。

陳文俊(1997)發現，媒介使用與大專生政治信任感呈顯著負相關。

陳文俊(1998)在分析 1991 年與 1997 年針對中、大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研究調查資料後亦發現，媒體使用與國中生的政治信任感呈顯著負相關。

陳憶寧(2001)針對 2000 年總統大選的報紙攻擊性報導的研究發現，攻擊性報導量與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呈現負相關。

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媒體對於尚未根深蒂固的態度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傳播媒體的主要功能是增強現有的政治定向，而不是改變舊有的或創造新的定向(Dawson & Prewitt, 1969; Weissberg, 1974; 轉引自鄧文勤, 1985)。

郭貞(Kau, 1985)將 Jennings 和 Niemi 所蒐集的美國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調查資料分析後，發現媒體對於政治認知的累積確有明顯效果，但對政治信任感的形成卻無影響(引自陳文俊, 1997)。

王錦雀(1995)在研究「臺灣地區國中公民科教師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時發現，公民科教師的政治信任感與其政治消息閱聽行為之間未達顯著相關。

曾俊傑(1995)研究指出，傳播媒介使用越頻繁，政治信任感越低；傳播媒介接受則未有顯著差異。

張卿卿(2002a)針對選民發現，競選新聞的暴露與否並未對選民的政治效能感與政治懷疑(政治信任感)造成顯著差異。

另一方面，就新聞媒體在政治系統中的積極功能來看，民主社會的媒體享有新聞自由，得以將政治環境中的各種資訊加以蒐集、傳達給民眾，藉此過程，民眾可以更清楚的了解政治運作的過程，而不再是憑個人的臆測去想像政府與政治人物的種種作為。藉由媒體，政治的運作得以公開化、透明化，政治人物、政府與政策均被攤開在新聞媒體中接受民眾檢驗。就此角度而言，新聞媒體應是有助於民眾的政治功效意識的增進，並進一步提升其政治信任感。與此論點相合的研究如下：

Feigert(1976)使用 Almond 與 Verba 在 1963 年的五國調查研究，發現接觸媒體越多者，政治訊息越豐富，並指出許多研究均發現媒體使用有助於提高政治功效意識。

Rubin(1978)研究美國伊利諾州平原鎮公立學校學生時，發現電視收看會促使學生對政治產生政治支持的傾向(引自張士政，2000)。

Inkeles (1969) 研究即指出智利、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阿根廷五國人民，政治信任感越高，政治消息傳播行為越高(引自林嘉誠，1989)。

1996 年美國選舉研究中心(NES)測量民眾如何看待新聞和媒體組織時發現，民眾的媒體暴露和對政府信任並無顯著相關，但民眾注意新聞媒體內容的程度與其對政府的信任程度產生顯著正相關(引自彭芸，2001)

Bennett 等人利用 1996 年美國選舉研究中心(NES)與 1997 年波研究中心的民調資料進行比較，結果發現民眾對媒體的態度與政治信任感相關，亦即民眾對媒體的信任程度與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成正相關(引自彭芸，2001)。

辜淑琴(1985)的研究指出，傳播媒體政治社會化程度越高的受試者，對政策具有越高度的信任感。

段盛華(1988)發現，越信任傳播媒體、引用媒體政治訊息報導越多者，對於政府及政策有較高評價，對於政治系統亦較支持。

劉行健(1989)研究結果，政治訊息傳播行為越頻繁，總體政治情感越高。

陳文俊(1997)發現，媒介接受與政治信任感呈顯著正相關，且相關性較媒介使用更加顯著。

陳文俊(1998)發現媒體接受與國中生、高中生、專科生、大學生的政治信任感均呈顯著正相關。

葉佳文(2001)發現，大眾傳播媒體接觸度，與政治信任感達顯著正相關。亦即接觸傳播媒體的政治消息越多，對政治的信任感越高。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雖然新聞媒體與政治信任感之間應該是正相關或負相關，學者並無定論，但整體說來大多肯定兩者兼具有相關性。這並非意味頻繁地接觸所有的大眾傳播媒體均會與政治態度產生關聯性。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媒體的內容是否與政治相關、具備政治性的節目（陳義彥，1977：227）。再者，大眾傳播媒體與閱聽人產生的影響並不全然相同，因為民眾可以依照其偏好對於媒體進行選擇性的接觸；而即使面對同樣的媒體，每個人的理解程度亦有所差異。此外，因為個人持有的政治立場不同，對於同一個政治訊息將有不同的解讀方式，進而產生不同的影響。本研究雖不假設新聞媒體與政治信任感之間的因果關係，但仍應注意閱聽人具有「選擇性暴露、選擇性理解、選擇性記憶」甚至「選擇性忽略」的特點(祝基滢，1983)，在將本研

究結果推論至全台北市高中生時應該特別謹慎。

由本節的文獻探討可知，早期的研究指出受試者具有中高程度的政治信任感，但後期的研究卻發現政治信任感有偏低的趨勢，且這些文獻大多是政黨輪替前的研究結果。而新聞媒體的閱聽行為大約僅有中等左右的程度。

而個人背景對政治信任感造成的影響，以及新聞媒體與政治信任感之間的關聯性等研究，卻是隨著不同的時期而發現不同的研究結果，尤其是葉佳文(2001)於政黨輪替後所做的研究，發現許多迥異於先前研究之結果，其研究結果是否與執政黨更換為民進黨有關？或只是巧合？

本研究除了希望了解現階段高中生的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傾向外，更希望探討個人背景因素在高中生的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上，具有多大的影響力，並且釐清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之間的究竟有無關聯？相關性如何？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假設高中生的新聞媒體閱聽行為、政治信任感，將因個人背景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新聞媒體閱聽行為與政治信任感之間具有關聯性，並針對台北市公立高中學生進行實證性調查，以驗證假設是否成立。

本章小結

本章第一節先探討公民教育的內涵，以說明高中生已具有一定的政治認知基礎，具備理解政治新聞內容以及對政治情境作出評價的能

力。第二節與第三節分別整理出政治信任感與傳播媒體的相關理論語文獻，闡述政治信任感的意義、對象、重要性以及傳播媒體的概念，並以議題設定理論說明新聞媒體對於閱聽人政治認知與政治評價的影響。第四節中則列舉了新聞媒體與政治信任感之相關研究，以釐清本研究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及相關性，並作為研究結果的驗證依據與比較文獻。

經由第二、三、四節之文獻探討結果，本研究以高中生的個人背景因素(包括性別、籍貫、家庭社經地位、政黨支持傾向)作為自變項，將政治信任感與新聞媒體閱聽行為列為依變項；其中，政府成員(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政府與政策均是政治信任感的取向對象，而新聞媒體閱聽行為欲探討的範圍包括對於新聞媒體的使用程度(包含暴露程度與內容注意程度)、接受程度以及選擇新聞媒體時的考量因素。

研究架構與研究設計將於第三章中詳加說明。